

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戴震*

——以清末民初学者对其考据学之“科学”性的评估为核心

李帆**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北京,100875)

[摘要]:清末民初,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胡适等学者在总结清代学术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引入了自西方而来的科学视角看待考据学,特别是戴震为代表的皖派考据学,力图在中国学术传统里发掘出西方式的科学精神或科学方法,以利于正处西学冲击下的中国学术实现现代转型。

[关键词]:清末民初 考据学 戴震 “科学”

[中图分类号]:B24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04)04-0093-04

清末民初,学术界掀起一股回顾和总结中国学术发展史的潮流,其中尤以对有清一代学术的总结为重点。在这方面,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开启端绪,胡适、钱穆等人随后也做了一系列工作。清代学术以考据学为表征,考据学自是受到这些学者的共同关注,但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此时他们之看待考据学,已引入了自西方而来的科学视角,即把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作为评估尺度,这自然是时代条件所赐。众所周知,戴震是清代考据学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所以他的考据学成就理所当然地为清末民初这些学者所重视。他们评价戴震之学,即是所谓“科学”性作为前提的。

一、科学视角的引入

清末,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开始对清学史的研究之时,也正是西学大举涌入中国之日。对当时学界而言,怎样把握这一全新的学科体系?它与中国固有学术的关系如何?以及一系列与此相关的问题,均是亟待认识与解决的,因这关涉中国学术如何适应时代变化,从而向现代转型的关键问题。于是,在清学史的研讨中,梁启超、刘师培便把考据学与西方科学联系起来,引入科学视角评估以戴震为代表的考据学,试图从中寻求一条既与西方接轨、又能保持中国传统的学术更新之路。

在1904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近世之学术》中,梁启超指出:“本朝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饶有科学的精神,而更辅以分业的组织。惜乎其用不广,而仅寄诸琐琐之考据。所谓科学的精神何也?善怀疑,善寻问,不肯妄徇古人之成说,一己之臆见,而必力求真是真非之所存,一也;既治

一科,则原始要终,纵说横说,务尽其条理,而备其左证,二也;其学之发达,如一有机体,善能增高继长,前人之发明者,启其端绪,虽或有未尽,而能使后人因其所启者而竟其业,三也;善用比较法,臚举多数之异说,而下正确之折衷,四也。凡此诸端,皆近世各种科学所以成立之由,而本朝之汉学家皆备之,故曰其精神近于科学。……夫本朝考据学之支离破碎,汨殁性灵,此吾侪十年来所排斥不遗余力者也。虽然,平心论之,其研究之方法,实有不能不指为学界进化之一征兆者。”^[1]此时的梁启超对清学的整体评价并不高,但却承认清代学者有科学精神,只是惜其仅用之于考据学。他之所谓“科学的精神”,全系西方近代学术赖以发展壮大基本精神,故中国考据学家具备此精神,实为“学界进化之一征兆”。

科学精神之讲求,首在于将“实事求是”作为学术研究之目的,梁启超指出了这一点,但未将其具体落实到对清学各派的评价上。实则并非清学各派都具实事求是之风,惠派主“求古”,戴派方主“求是”。刘师培即对戴派学术与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关联甚有体会,在发表于1907年的《崔述传》中,他指出:“近世考证学超越前代,其所以成立学派者,则以标例及征实二端。标例则取舍极严,而语无咙杂;征实则实事求是,而力矫虚诬。大抵汉代以后,为学之弊有二,一曰逞博,二曰笃信。逞博则不循规律,笃信则不求真知,此学术所由不进也。自毛奇龄之徒出,学者始误笃信之非,然以不求真知之故,流于才辩。阎若璩之徒渐知从事于征实,辨别伪真,折衷一是,惟未能确立科条,故其语多歧出。若臧琳、惠栋之流,严

* [收稿日期]:2004-06-28

** [作者简介]:李帆(1961-),辽宁抚顺人,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侧重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史的研究。

于取舍,立例以为标,然笃信好古,不求真知,则其弊也。惟江、戴、程、凌,起于徽歙,所著之书,均具条理界说,博征其材,约守其例,而所标之义、所析之词,必融会贯通以求其审,缜密严栗,略与哲种之科学相同,近儒考证之精恃有此耳。”^[2]即为学只有破除“逞博”、“笃信”二弊,坚守“标例”、“征实”二端,才“略与哲种之科学相同”,而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唯有皖派学者。

在考据学与科学之关系的问题上,章太炎亦有自己的看法。他是反对将西方学术原理机械套用于中国学术史研究上的,但他所归纳出的清代考据学学术特色与方法,实与梁启超、刘师培借西方科学概念所作之描述颇为相近。他说:“盖近代学术,渐趋实事求是之途,自汉学诸公分条析理,远非明儒所能企及。逮科学萌芽,而用心益复缜密矣。”^[3]他还把这种“实事求是”精神与方法归结为六条,且认为戴派学者最合此例,即“审名实,一也;重左证,二也;戒妄牵,三也;守凡例,四也;断情感,五也;汰华辞,六也。六者不具,而能成经师者,天下无有。学者往往崇尊其师。而江、戴之徒,义有未安,弹射纠发,虽师亦无所避。”^[4]可以说,他虽不像梁、刘那样正面谈考据学与西方科学精神之关联,而且对动辄标榜科学有反感,^[5]但其所论,亦不出今日广义所言之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所以如此,盖因中西学术在态度与方法上实有相合之处,不管是否用“科学”一语,精神实质都是一样的。

二、戴氏考据学的“科学”性

尽管清末之时,梁启超、刘师培等人研讨清学史时,已引入了科学视角,使得中国学术史的研究在旧有格局下增添了新的评估标准。但这种工作在当时是相当初步的,既不成体系,影响面又小。真正把考据学尤其是戴氏考据学与西方科学等同起来,并由此而在学术界产生巨大反响的时机,则是在进入民国以后,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倡“赛先生”(科学)之时,而这样做的主将仍是梁启超以及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

前已言及,1904年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近世之学术》时,梁启超对清代考据学评价不高,虽称其有科学精神,却又认为它失经世致用之旨,“其用不广,而仅寄诸琐琐之考据”。到1920年撰《清代学术概论》时,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不再以是否经世作为评价学术之标准,而是主“为学问而治学问”。他说:“正统派所治之学,为有用耶?为无用耶?此甚难言。……有用无用云者,不过相对的名词。老子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此言乎以无用为用也。循斯义也,则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夫用之云者,以所用为目的,学问则为达此目的之一手段也。为学问而治学问者,学问即目的,故更无有用无用之可言。……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之,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

无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夫清学派固能成为学者也,其在我国文化史上有价值者以此。”^[6]需要指出,近代学者中认识到学术具有独立价值,不能过分强调学术经世的并非始自梁启超,早在1906年章太炎发表《与人论朴学报书》时,就以汉儒为例,说明此理,“通经致用,特汉儒所以干禄,过崇前圣,推为万能,则适为桎梏矣。”^[7]即过于强调学术的经世功能,会助长学人的干禄躁进之风,如此,学术对象的真正面貌便难以准确了解。此后,章氏又有一系列相关论述谈及此问题。梁启超在章氏之后全面系统地阐明了近代学者对学术所应抱持的客观超然态度,凸显学术的独立性与非功利性,这表明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型的时机已成熟,即不只一个学界领袖对学术非为手段而是目的有了较为深切的认知,从而在思想意识上接受了这种导致西方学术(科学)发达的现代理念,接下来所要做的自然是在学术研究中期以体现。所幸清儒从事的考据研究在表象上与这种理念颇为相似,为中国学术向现代转型提供了一个可资参照的对象,故梁启超等人均抓住此一契机,从对清学的评价入手寻求更新传统学术的资源。

既然梁启超眼里的清代考据学有“为学问而治学问”的精神,与西方科学相近,那么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一再强调此点,视之为自己论清学史的一大特色,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梁氏一向视惠栋之学为“求古”之学,戴震之学为“求是”之学,而与科学方法相近的是“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所以他虽谈的是考据学与科学的关联,实际上主要是指戴派考据学与科学的关联。他认为,“戴震之精神”“清学派之精神”与近代西方“实证哲学派”的精神相通。他引用戴震《与姚姬传书》中的一段话作为证明,戴氏书中言:“凡仆所以寻求于遗经,惧圣人之绪言,暗汶于后世也。然寻求而获,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导,循根可以达杪,不手披枝肆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以此治经,失不知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识者之辩之也。”^[8]梁则说:“其所谓十分之见与未至十分之见者,即科学家定理与假说之分也。科学之目的,在求定理,然定理必经过假设之阶级而后成。初得一义,未敢信为真也,其真之程度,或仅一二分而已,然姑假定以为近真焉,而凭藉之以为研究之点,几经试验之结果,寢假而真之程度增至五六分,七八分,卒达于十分,于是认为定理而主张之。其不能至十分者,或仍存为假说以俟后人,或遂自废弃之也。凡科学家之态度,固当如是也。震之此论,实从甘苦阅历得

来。”^[9]由此可见,梁启超心目中的戴震考据学简直就是西方科学精神在中国的翻版,只是“惜乎此精神仅应用于考古,而未能应用于自然科学界,则时代为之也。”总之,戴学诸公之所以成就巨大,“一言以蔽之曰:用科学的研究法而已。”^[10]

在《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缘起》中,梁启超再次强调戴震之研究法的重要,说:“东原本自己研究出来的成绩品,可宝贵的虽然甚多,但他同时或后辈的人有和他一样或更优的成绩品的也不少。东原在学术史上所以能占特别重要位置者,专在研究法之发明,他所主张‘去蔽’‘求是’两大主义,和近世科学精神一致。他自己和他的门生各种著述中,处处给我们这种精神的指导。这种精神,过去的学者虽然仅用在考证古典方面,依我们看,很可以应用到各种专门科学的研究,而且现在已经有一部分应用颇著成绩,所以东原可以说是我们‘科学界的先驱者’。”^[11]即在梁氏眼里,戴震的学术成就固然重要,但其在学术史上之所以有崇高地位,关键还不在于此,而是在于其“和近世科学精神一致”的“研究法之发明”,正由于此,他才是“科学界的先驱者”。

从梁启超的上述言论来看,他此时对戴震的推崇,主要着眼于其治学方法和治学精神的“科学”性。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一是因梁氏论述清代学术有用文艺复兴比拟的大框架,而欧洲文艺复兴之对科学的探究,无疑会启发他寻找在中国的对应物。二是五四时期科学思潮的兴起和胡适对科学方法的大力推介,对梁氏产生了较大影响。梁氏之《清代学术概论》和纪念戴震二百年诞辰的一系列论著,其写作皆笼罩在五四科学主义思潮大流行的总体氛围下,是不争的事实,^[12]而好友胡适对此一潮流的全力推动以及在清儒考据学中发掘科学方法的做法,是对梁氏的又一层刺激。^[13]需要指出,《清代学术概论》的写作有胡适的鼓励,初稿经胡适过目并提出修改意见。不仅如此,胡适对清代考据学与科学之关系的看法与梁氏惊人地相似,他认为:“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总括起来,只是两点。(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清学的宗师戴震”是深通此“清学的真精神”的。^[14]他还说:“戴氏是一个科学家,他长于算学,精于考据,他的治学方法最精密,故能用这个时代的科学精神到哲学上去,……他的哲学是科学精神的哲学。”^[15]可见胡适同样十分赞赏戴氏之学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他所总结出的清儒治学方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亦是他本人倡导科学方法的十字箴言。若以之与前引梁启超论戴震的某些议论相较,^[16]则更可看出胡适此语与梁氏之议

论以及戴震之主张的一致性。也许不能单纯强调此时胡适对梁启超的影响,说两人相互影响、相互启示可能更合适。总归经由两人的共同努力,以戴氏考据学为代表的清代学术近于科学的说法,在当时广为人知并产生相当深远的影响。

梁启超与胡适用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作尺度来解释与评估戴氏考据学,其目的是想在中国学术传统里发掘出西方式的科学精神或科学方法,以利于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梁、胡之用意和其努力之成果固然可嘉,但问题在于,以戴氏考据学为代表的“方法”与“精神”是否真的为“科学”?侯外庐先生曾指出,清儒的治学精神,“在梁任公、胡适之论来,便崇赞为‘近世的科学方法’。这是似是而非的论断。”侯氏承认戴震关于治学的见解,“合于一部分科学的精神,它的主要内容是‘无所顾虑’。然而乾嘉学者不是在严格意义上‘无所顾虑’的,大部分汉学家,因为没有将来社会的信仰,在结论上还是被古道所桎梏的,换言之,在古籍的狭小天地中只有科学态度的冷静,而没有科学态度的热力,这热力是要超出于古籍而进入于物质世界与光明社会的。”“所以,乾嘉汉学,是有科学精神的要素,而不是代表科学方法。”^[17]张君勱也反对把考据学方法与西方科学方法等同,他在评论《清代学术概论》时指出:“考证学在西方名曰文字学,如柏拉图氏之书之真假之研究,古代名物之研究,均属此项文字学,倘以文字学中之科学方法,视之与汉学家所用之方法,为同一科学方法,则西方培根氏所提倡之新方法,岂不等于古纸堆中之生活,何以能成为科学界之先驱呢?”^[18]此外,当代学者林毓生、郭颖颐亦认为胡适等人对科学方法有误解,胡所持的只是科学主义信仰,他把现代科学方法与清代学者的“经验主义”等同起来,是牵强而又浅薄的。^[19]平心而论,以今日之学术眼光来论定梁启超、胡适把清代考据学与西方科学相等同的做法是一种牵强附会,颇为容易,且有学者已进一步指出:“胡梁等近代学人之所以能够将清代学术抬举为科学,乃是采用了将‘科学’的‘方法’与‘精神’从科学系统中抽离出来的手法,而这一点恰是成问题的。”^[20]这些论述都是非常恰当的。但问题在于,若回到梁启超、胡适当年为此论的语境中去,就不能不首先承认梁、胡之论的合理性与积极意义。在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刻,欲将古老的经、史、子、集四部转化为与现代西方学术相似的学科分类体系,从而实现中国学术“科学化”的目标,其入手处必为中国古学中具“科学”色彩的学科。但就像梁启超所坦承的,“我国数千年学术,皆集中社会方面,于自然界方面素不措意,此无庸为讳也。”^[21]故难于从自然界所涉学科起步,而社会方面的经史考证之学恰在方法手段上似与西方科学相近,

易于成为与西方科学相接的突破口。所以要首先从此形似于却非神似于科学的考据之学入手,实现中西学术的相通相融。实则胡适等人后来也意识到仅靠从故纸堆中寻求“科学方法”、“科学精神”,是不能给中国学术带来近代西方式的进步的。这种“事后诸葛亮”

式的认识固然有其意义,但起初就考虑到从中国传统学术里寻求导引学术走向现代的资源,无论如何也是值得肯定的。对于今日学术界,肯定之余所需思考的应该是:在把考据学之类纳入“科学”大框架,“科学”思维笼罩一切之后,中国学术失落了什么?

参考文献

- [1]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第1册.《饮冰室文集》之七.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87页.
- [2]刘师培.《崔述传》.《左盦外集》卷十八.《刘中叔先生遗书》.民国二十五年宁武南氏排印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重印.第1825页.
- [3]章太炎.《答铁铮》.《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0页.
- [4]章太炎.《说林》下.《章太炎全集》(四).第119页.
- [5]在《征信论》中.章太炎指出:“近世鄙倍之说.谓史有平议者.合于科学.无平议者.不合科学.案史本错杂之书.事之因果.亦非尽随定则.纵多施平议.亦乌能合科学耶?”“盖学校讲授.徒陈事状.则近于优戏.不得已乃多施平议.而已不能自知其故.藉科学之号以自尊.斯所谓大愚不灵者矣!”(《章太炎全集》(四).第59.60页.)此可见其对标榜科学之态度.
- [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0页.
- [7]章太炎.《与人论朴学报书》.《章太炎全集》(四).第154页.
- [8]戴震.《与姚孝廉姬传书》.《戴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84.185页.
- [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30.31页.
- [1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31.37页.
- [11]梁启超.《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缘起》.《饮冰室合集》第5册.《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38页.
- [12]按梁启超此时的心态颇矛盾.1920年春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的欧洲返国.有感于所看到的西方文明的破败.因而提倡中国传统文化.欲以之救西方文明之衰颓.另一方面.他又赞美西人方法论的精致与科学.因而主张输入之.前者与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潮流相违.后者却又相符.他的《清代学术概论》等著作强调清儒治学的“科学”性.是体现了后者的.应该说.关于五四时期的梁启超思想.是一相当复杂的问题.囿于主题.本文只谈输入“科学”这一方面.特此说明.
- [13]此时胡适正发起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运动.而且他对此一“方法”极为重视.晚年曾自述:“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见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4页.
- [14]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文存》一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285.298-300页.
- [15]胡适.《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胡适文存》三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74页.
- [16]戴震有“所谓十分之见与未至十分之见者.即科学家定理与假说之分也.科学之目的.在求定理.然定理必经过假设之阶级而后成.”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30页.
- [17]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上册.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版.第370-372页.杨念群也认为:“乾嘉学术的经验式研究与西方实证主义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于.它隐含着不变的知识论前提.经典中所蕴藏的知识信息在源起的状态下已经具有了自足的性质.其合理性是不容置疑的.之所以后来出现偏离是经书摹仿与王学传统主观歪曲的结果.经验研究的目的是证明某种历史的客观存在的意义.而是证明经书微言大义的初始的自足合理性.所谓‘识字’并非排除义理的辨析而是作为阐明义理的基础.”见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3.34页.
- [18]张君勱.《评梁任公先生〈清代学术概论〉中关于欧洲文艺复兴、宋明理学、戴东原哲学三点》.《民主评论》第15卷第2期.1964年1月
- [19]林毓生.《民初“科学主义”的兴起与含意》.《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52-272页;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7.78页.
- [20]刘巍.《钱穆与胡适梁启超关于清代学术史整理的思想交涉——以戴震研究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1999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65页.
- [2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24页.

On Dai Zhen of the Modern Chinese Academic History

Li Fan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day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Zhang Taiyan, Liu Shiwei, Liang Qichao and Hu Shi had had th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in summing up the Qing dynastic academy. They treated Kao Ju Xue especially the Kao Ju Xue of Wan school that Dai Zhen had represented through the scientific angle of view from West. Their aim was that discovering the scientific spirit or scientific method of the Western model from the Chinese academic tradition and causing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academy under the Western academy battering.

Key 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day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Kao Ju Xue; Dai Zhen; "Science"